



# 文化社會學

## 社會生活的意義

THE MEANINGS OF SOCIAL LIFE  
A CULTURAL SOCIOLOGY

Jeffrey C. Alexander◎著

吳震環◎譯



# 文化社會學

## 社會生活的意義

THE MEANINGS OF SOCIAL LIFE  
A CULTURAL SOCIOLOGY

Jeffrey C. Alexander◎著

吳震環◎譯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文化社會學：社會生活的意義 / Jeffrey C. Alexander 著；吳震環譯。

—1版。—臺北市：五南，2008.06

面；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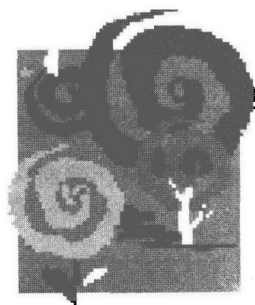
譯自：The meanings of social life: a cultural sociology

ISBN 978-957-11-5215-8 (平裝)

1. 文化 2. 社會學 3. 社會生活

541.48

97007984



1JBP

## 文化社會學：社會生活的意義

作 者 — Jeffrey C. Alexander

譯 者 — 吳震環

發行人 — 楊榮川

總 編 — 龐君豪

主 編 — 陳念祖

責任編輯 — 李敏華 雅典編輯排版工作室

封面設計 — 哲次設計

出 版 者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106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339號4樓

電 話：(02)2705-5066 傳 真：(02)2706-6100

網 址：<http://www.wunan.com.tw>

電子郵件：[wunan@wunan.com.tw](mailto:wunan@wunan.com.tw)

劃撥帳號：01068953

戶 名：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駐區辦公室 / 台中市中區中山路6號

電 話：(04)2223-0891 傳 真：(04)2223-3549

高雄市駐區辦公室 /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290號

電 話：(07)2358-702 傳 真：(07)2350-236

法律顧問 元貞聯合法律事務所 張澤平律師

出版日期 2008年6月初版一刷

定 價 新臺幣420元

# **The Meanings of Social Life**

A Cultural Sociology

Jeffrey C. Alexander

Copyright © 2003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This translation of *The Meanings of Social Life*,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3,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此書是翻譯2003年出版的"*The Meanings of Social Life*"，由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授權翻譯。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8 by Wu-Nan Book Inc.

# 序

我在本書闡述的觀點源自我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攻讀研究所期間，羅伯特·貝拉（Robert Bellah）播下的種子。在文化轉向前數年，貝拉提出的「象徵性現實主義」（symbolic realism）概念就已經指明了路。構成本書各章的論文都是脫胎自這顆種子，但開始出現，還得等我在社會學上的理解經過一番轉換。這轉變始自 1980 年代中期，並持續至 2001 年我離開洛杉磯，當時我已經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執了 25 年教鞭。

這時期剛好可以切成二段，當時的我可以心無旁騖、密集地進行研究：一是 1985 年至 1986 年，當時我人在普林斯敦高等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Princeton）；二是 1998 年至 1999 年，在帕洛阿爾托（Palo Alto）的行為科學高等研究中心（Center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我要感謝當時接待我的主人，分別是普林斯敦的麥可·華徹（Michael Walzer）和帕洛阿爾托的尼爾·史美舍（Neil Smelser）。他們立下的知識典範和堪為表率的為人深深地影響了我的知識生活。1993 年至 1994 年是我的休假年，當時我在巴黎的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Ecole des Hautes Etudes des Sciences Sociales）擔任客座教授。我要感謝亞蘭·杜漢（Alain Touraine）、米歇爾·韋維爾卡（Michel Wiewiorka）、方斯華·居貝（Francois Dubet）和行為科學高等研究中心的同事，他們在那令人深受鼓舞的一年中，給了我他們的友誼和支持。1990 年代，我二度在瑞典的烏普薩拉（Uppsala）做停留，在朋友兼同事畢雍·維特羅克（Bjorn Wittrock）主持的瑞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中心（Swedish 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in the Social Sciences）擔任研究員。這二次長時間停留也令我受惠。

我在一種很特別的情況下，陸續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研究生建立起的緊密關係，在我這時期的思考和發展上，留下了非常重要的



痕跡。1984年，為了探索一種新的、具文化性的社會學的可能，我和願意一起踏上這趟知識旅程的研究生組成了一個討論小組。接下來15年，我們一個月聚會一次，有時在他們的公寓，有時在舍下。我們用批判但支持的方式讀彼此的論文，就激起社會學界的文化轉向可能需要的條件，進行自由、天馬行空的辯論。雖然這個最後被稱為「文化俱樂部」(Cultural Club)的團體成員漸變，但還是維持著穩定的知識風氣，一如參與的學生展現出的優異水準。本書接下來各章講述的觀念很多都是源自這些儀式化的場合。許多從「文化俱樂部」畢業的學生現在都已經是教授，有些甚至成了我的同事。第二代的文化俱樂部如今仍繼續在我目前居住的美國東岸運作，當中的成員接下了他們的棒子。

同樣是在這段時間，我的個人關係形成的緊密網絡，也提供了本書呈現的觀念養分。羅傑·佛萊德蘭(Roger Friedland)、尼可拉斯·恩翠金(Nicholas Entrikin)、史蒂芬·謝德門(Steven Seidman)、肯尼士·湯普森(Kenneth Thompson)、貝哈德·吉森(Bernhard Giesen)和榮恩·艾爾曼(Ron Eyerman)——我們不但交情深厚，也持續就社會生活的意義和意義的社會生活進行對話。他們給我信心，也提出批評，每一位都曾在不同時地幫助我獲得重要肯定。少了他們，我自己絕對做不到。

三段親密關係提供了我這段時間成長需要的養分。我要感謝茹絲·布洛赫(Ruth Bloch)和瑪麗亞·琵雅·拉若(Maria Pia Lara)在知識上的激勵以及對我個人和研究的信心。

感謝內人萊瑞兒·摩頓(Morel Morton)為我做的一切。她的慈愛是我這研究最後幾年的支持；我知道，未來她將給我更多。

## 致 謝

感謝下列刊物允許我重新發表這些原先發表於其上的論文。為了這次的出版，這些論文大部分都有經過修訂。

1. "Cultural Sociology or Sociology of Culture: Towards a Strong Program for Sociology's Second Wind," with Philip Smith, in *Sociologie et Societes* 30 (1) 1998.
2. "Modern, Ante, Post and Neo: How Intellectuals Have Tried to Understand the 'Crisis of our Time,'" in *Zeitschrift fur Soziologie* 23 (3) 1994.
3. "The Discourse of American Civil Society: A New Proposal for Cultural Studies," with Philip Smith, in *Theory and Society* 22 (2) 1993.
4. "The Promise of a Cultural Sociology: Technological Discourse and the Sacred and Profane Information Machine," N. Smelser and K. Munch, eds., in *Theory of Cultur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5. "Towards a Sociology of Evil: Getting Beyond Modernist Common Sense about the Alternative to the Good," in M. P. Lara, ed., *Rethinking Evil: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 目 錄

序

致謝

## 導論——「社會」生活的意義：論文化社會學的起源 1

## 1 文化社會學中的強勢綱領：結構詮釋學的組成要素 11

斷層線與其後果 13

從古典到 1960 年代：社會理論中的文化 16

當代文化理論中的薄弱綱領 19

邁向強勢綱領 25

結論 31

## 2 道德普世主義的社會建構：從戰爭罪到創傷劇的「大屠殺」 33

創傷的文化建構 40

背景建構 43

進步敘事下的集體屠殺 48

悲劇敘事下猶太人經歷的集體屠殺 62

大屠殺：一種紐帶隱喻 85

遺忘或存留於記憶中？ 97



大屠殺為西方特有？ 106

### **3 文化創傷與集體認同 143**

日常用語與反身性 144

常民創傷理論 145

啟蒙式的思考 146

精神分析式的思考 148

自然主義謬誤 151

文化創傷的社會過程 153

創傷的創造與實際——道德行動：對非西方世界的適用性 169

### **4 惡的文化社會學 179**

惡的移置的知識根源 181

惡在當代社會科學中的移置 185

給惡應得的地位 187

懲罰：社會過程與制度 189

越界和申明惡與善 191

### **5 美國公民社會論述 203**

歷史上對美國公民論述的闡述 210

|                     |     |
|---------------------|-----|
| 抨擊美國總統              | 211 |
| 評價制度和企業             | 218 |
| 對政府政策表示異議           | 226 |
| 當代的美國公民論述           | 228 |
| 理查·尼克森和水門案          | 229 |
| 現代醜聞：伊朗軍售與尼加拉瓜反抗軍事件 | 234 |
| 現代外交政策：理解戈巴契夫和開放政策  | 239 |
| 結論                  | 243 |

## 6 水門案：一場民主儀式 251

## 7 神聖與世俗的資訊機器 281

|              |     |
|--------------|-----|
| 視科技無意義的社會學論述 | 283 |
| 科技論述與救贖      | 289 |
| 神聖與世俗的資訊機器   | 291 |
| 結論           | 298 |

## 8 「現代」、「反」、「後」和「新」：知識分子如何解釋「當代」 301

|        |     |
|--------|-----|
| 新的「轉型」 | 304 |
|--------|-----|

|                     |     |
|---------------------|-----|
| 現代化：符碼、敘事與解釋        | 307 |
| 反現代化理論：英雄式的捲土重來     | 317 |
| 後現代化理論：聽任順從和喜劇式的抽離  | 321 |
| 新現代主義：戲劇性的拉抬和普遍範疇   | 328 |
| 新現代主義與社會惡：散布污染的民族主義 | 334 |
| 現代化復返？線性論的傲慢        | 351 |

## 專有名詞索引 365

英文書幾乎都附有厚厚的參考資料，這些參考資料少則 10 頁以上，多則數十頁；中文翻譯本過去忠實的將這些參考書目附在中文譯本上。以每本中文書 20 頁的基礎計算，印製 1 千本書，就會產生 2 萬頁的參考書目。

在地球日益暖化的現今與未來，為了少砍些樹，我們應該可以有些改變——亦即將英文原文書的參考書目只放在網頁上提供需要者自行下載。

我們不是認為這些參考書目不重要，所以不需要放在書上，而是認為在網路時代我們可以有更環保的作法，滿足需要查索參考書目的讀者。

我們將本書【參考書目】放在五南文化事業機構（[www.wunan.com.tw](http://www.wunan.com.tw)）網頁，該書的「教學資源」部分。

對於此種嘗試有任何不便利或是指教，請洽本書主編。

THE MEANINGS OF  
*Social Life*

導論 —  
「社會」生活  
的意義：論文化  
社會學的起源

現代男女生活日復一日，卻不真的明白為何如此。為何每天工作這麼久？為何結束戰爭，只是為了另啟戰端？為何我們如此迷戀科技？為何我們所處的時代醜聞不斷？為何我們會覺得自己得向那些因不義被殺害的人致敬，如大屠殺（Holocaust）的死難者？

若有必要為這些事提出解釋，我們會說「這才有道理」，「就是得這樣」，或「好人都會這麼做」。然而，這當中沒有什麼本就該是如此。沒有人會自然而然就去做那些事。我們是被迫依此行事。

我們並不像自己以為的那麼講道理、明智或通情達理。莫名的原因對生活的控制，仍然多於已知。內心感覺和令人恐懼的直覺仍然驅使著我們。

今天，美國與其盟國正在推動反恐戰爭。據說這是必要且合理的，是確保安全的一種手段。反恐戰爭就只是這樣，或主要是這樣？答案是否定的，因為這場戰爭倚靠幻想，也倚靠事實。為了保護美國和歐洲的人民所做的努力，被裹在種種修辭中，如善與惡、朋友與敵人、光榮／良知／忠誠、上帝與國家、文明與混沌。這些修辭並非只是觀念而是情感，強烈的情感。我們的領袖以肅穆的口吻提出這些修辭，而我們以極盡誇張之能的祝禱儀式向恐怖主義的死難者致意。

這些修辭都是文化結構，在釋出強烈約束力的同時，也提供動能。問題是，我們並不瞭解這些文化結構。這就是文化社會學的任务：使規制社會、但人們渾然不覺的文化結構為人所知。理解可能會改變文化結構，但無法將之驅散，因為少了這樣的結構，社會便無法存在。我們需要神話，才能自物質生活的單調乏味超脫。我們需要敘事，才能前進，體驗悲劇。我們需要區分神聖與世俗，才能逐善，並使自己不被惡所傷。

當然，人在行動時都只是一知半解，不分男女皆是如此，這是社會科學的一貫假定。社會學家業已將這歸之於比個人「更大」、「更具力量」的社會結構擁有的力量。換言之，他們指的是社會生活的強制面。

但叫我著迷又恐懼的，是那些不具強制力的集體力量，亦即我們熱切、自動回應的社會力量。若我們認可這些力量，卻不知箇中原因，都是因為「意義」(meaning)。唯物論(materialism)也是一則關乎事物神聖性的傳奇，但我們並未被迫接受。科技並非只是一項工具，也是目的、慾望、貪念和救贖信念。人並不邪惡，而是被形塑成這個模樣。醜聞並非源於事實，而是自事實建構，所以我們才能滌淨自己。我們唯有先認同死難者，才會為集體屠殺感到哀痛，而這情形只有在種種象徵(symbols)以正確方式排列時，才會偶爾出現一次。

社會結構的強制力的秘密在於，這些結構是有內在面的。這些結構除了外於行動者，也在他們裡面。這些結構是有意義的。這些意義雖然是無形的，但還是有結構，是社會的產物。我們必須學會讓那些意義變得可見。佛洛伊德(Freud)認為，精神分析的目標是將潛意識化為意識：「本我曾在何處，自我就在何處。」文化社會學是一種社會的精神分析，目標是提升社會潛意識的層次，供人檢視。向男男女女揭露想像他們的神話，他們才能回過頭來創造新的神話。

1980年代中期，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教職員中心排隊取用午餐時，我和三位社會學系的同事激烈地辯了起來。當時有一位助理教授正在爭取終身教職，這事讓系上分成了支持和反對二派。對授與終身教職持懷疑的一派反對，認為該位人選的著作連社會學都勾不上邊。為什麼不算呢？我問道。他們的答案是，他研究的不是社會學，他的關注偏向社會結構的主體建構與詮釋，而不是社會結構自身的本質。他放棄討論社會結構性的因果，所以他放棄了解釋，因此也放棄了社會學本身。我反對這種觀點：他的研究確實不同，但仍是社會學研究——這很清楚。我認為或許可以將那視為一種「文化」社會學(“cultural” sociology)。

我這番意見並未達到預期效果，反而引起一種懷疑——他們先是竊笑，接著狂笑，最後捧腹大笑——這是真的。文化社會學？我的同事



嗤之以鼻。我的想法不僅深深地冒犯了他們的學科觀念，在知識上也讓他們覺得荒謬。「文化社會學」這個複合詞看起來很矛盾。你不能以文化為形容詞，社會學為名詞，然後將二個詞合在一起。若社會學有一個研究取向是以文化為主題，那應該是文化的社會學（sociology of culture），絕對不可能以文化為取向來研究社會學。

我的同事對社會學這個學科的今與昔的看法是對的，但發生的種種並不證明他們能夠預見未來。社會學在過去 15 年，已經出現一種新而特別的文化研究取向。這種取向前所未有——不曾見於社會學誕生以降的 150 年歷史中。在其他關切現代或當代生活的社會科學中，也看不到類似的文化取向。

文化的社會學從社會科學形成之初，就已經存在。不論其名為知識社會學、藝術社會學、宗教社會學，或意識形態社會學（sociology of ideology），集體意義的深遠影響受到許多社會學家的注目，只是詮釋集體意義並非這些文化的社會學家的主要關懷，遑論探查集體意義影響個人和團體的道德特質和微妙的情感路徑。「\_\_\_\_\_的社會學」取向（sociology-of approach）企圖說明什麼創造了意義，目標是揭露其他結構是如何形塑了觀感性的文化結構——那些結構的形體比較明顯，存在的時間也比較長。

到了 1980 年代中期，一群社會科學家開始反對這種「\_\_\_\_\_的社會學」取向；人數雖然不多，但正陸續增加。強烈反對那種取向的我，指控社會學存在著一種根本的誤解，這種誤解讓今日的社會學在研究文化時，依舊顯得綁手綁腳。承認理想、信念和情感具有強大的影響力，並不等於向（非社會學）的唯意志論（voluntarism）臣服，不等於相信人有隨心所欲的自由，也並不等於陷入社會學確實應保持界線的唯心論（idealism）中，或陷入能圓夢的道德論（moralism）中——社會學是這種立場的補救方法。文化社會學可以像唯物社會學一樣冷靜，具批判性。文化社會學之所以能讓集體情感和觀念成為其方法和理論的

中心，正是因為支配這個世界的，似乎往往是如此主觀的內在情感。社會建構的主觀性構成了集體的意志，形成了組織規範，確立了法律的道德內涵，並為科技、經濟、軍事機器提供了意義和動力。

然而，若唯心論非避開不可，那集體理想化的事實必定不行。在這個後現代的世界裡，真實的陳述和虛構的敘事緊密交織；二元的象徵性符碼（code）和真／假陳述互相嵌入彼此；幻想和現實無可救藥地相互纏繞，我們事後才可能將之分開來。這在現代社會也是如此。從這角度來看，自傳統生活到現在，並未出現多少改變，但古典社會學家和當代社會學家都不相信，並認為現代社會和「不理性」的傳統社會間，存在著劇烈、截然二分的斷裂。有鑑於現實並不像社會學界的先進以為的那麼顯而易見、那麼理性，發展另一種更具文化性的社會學是有必要的。

哲學中的語言學轉向，詮釋學重新被發現，人文科學中的結構主義革命，人類學中的象徵革命，和美國史學界中的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知識界發生的一連串重要事件改變了我對這個現實的敏感度，和我理解這個現實的能力。在這些當代發展背後，可以看見精神分析的思考仍繼續在知識生活和日常生活中散發活力。一種真正的文化社會學的發展，就是為了回應這些知識界中的重要變動——其發展雖然緩慢、不平衡，卻還是穩定成長。

我寫這些論文，並非企圖樹立一種文化典範。這些論文並未致力於概化、建立演繹理論。從這點來看，這些論文是後基礎論的（postfoundational）。借用梅洛龐蒂（Merleau-Ponty）的話，我將之視為在文化思想辯證中冒險。這些論文往返於理論建構和研究、詮釋和解釋、文化邏輯和文化語用學（pragmatics）之間；帶著古典、現代和後現代思維提供的一些範例投入詮釋性的論戰。

就算這些論文有提出典範，展現出其對概化的野心——從詮釋學的角度來看，也就是以科學為目標，但這些論文仍是源自於我對務實、且明顯是規範性事務的興趣。雖然經過一番洗練，但我這個後 60

年代的激進分子還是充滿希望。1972年，開始撼動美國社會的水門（Watergate）危機對我具有一種魔力。這個事件讓我看見民主仍未死去，也讓我看見在這個貪腐猶如家常便飯、資本主義仍然當道的後現代時代中，批判思考仍然可能。更吸引人的，是這個批判的承諾如何經由儀式化地展現神話和民主的偉大，揭示自身的存在。我將嘗試在第六章說明這樣的矛盾。

在這早期的政治研究之後，10年來，我轉而對新近復興的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概念感到興趣。同一時期，隨著我對民主制度的神話基礎的理解更周密，而更偏向符號語言學（semiotics），我發現民主社會正義抗爭行動背後，存在著一種極為模稜兩可的深層結構。我和菲力普·史密斯（Philip Smith）在第五章討論美國公民社會的二元論述時，將指出結合涂爾幹（Durkheim）和索緒爾（Saussure）的觀點，可以證明現代社會中的善與惡是以何種方式相連，民主解放運動又是如何常與民主壓迫結合。如我將在第四章指出，這些思考會指出一種惡的社會學的存在。一如其他為了實現規範性理想做的努力，現代性（modernity）對社會和文化的污染有著強烈幻想的同時，也被驅策要將這種幻想摧毀。

在第二章中，我試著理解已被界定為當代最大惡行的事件：大屠殺。這個惡行是被建構出來的，其並不是反映了現代現實的事實，而是構成現代現實的集體再現。將猶太人經歷的集體屠殺化為「腫脹」的惡（“engorged” evil），是道德普世主義（moral universalism）擴張的關鍵——這種道德普世主義表示我們的時代還是具有能讓人感到希望仍存在的潛力。那也示範了文化創傷（cultural trauma）形塑集體認同的方式，不論結果是好是壞。

「當代」這個觀念本身的確可以被理解為變動不居的敘事架構的產物。從這個角度思考，在第八章中，我將以文化社會學為研究取向，討論知識分子意識形態這個令人敬畏的主題。將知識分子比為祭司和先